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

经济学系列

百年论争

—20世纪西方学者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述要

Debate over the Century
An Overview of Western Scholars' Research on Marxian Economics
in the 20th Century

中

主 编 顾海良
副主编 常庆欣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



百年论争

—20世纪西方学者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述要

Debate over the Century

*An Overview of Western Scholars' Research on Marxian Economics
in the 20th Century*

中

主 编 顾海良

副主编 常庆欣

编 审 委 员 会 成 员

郭兆旭 吕 萍 柳 敏

前　　言

编写《百年论争——20世纪西方学者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述要》，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努力在做的一项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教学和研究密切相联系的工作。从2004年开始筹划，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10年了！

自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以后，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经历的第一个完整的世纪。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在20世纪的经济思想发展中，没有哪一种经济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样，如此密切地贴近人类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如此深刻地影响着百年来人类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如此长久地萦绕在经济思想论争和探索的主题之中。回顾百年历史，作为一种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历过凯歌行进的辉煌岁月，也曾度过如磐风雨摧折的艰难时辰，但却始终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作为一种经济思想流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几度辉煌而展示其思想光彩，也受过多方“责难”而被宣布为“过时”的境地，但却一再“复兴”而永葆其思想活力和学术魅力。

在回顾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命运时，不免使人想起20世纪中叶西方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顽固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反对者）约瑟夫·熊彼特（J. A. Schumpeter），在感慨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伟大”时所说的一番话。他谈到：“大多数智力或想象力的创作，经过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永远消失了。但有一些创作却不是这样，它们遭受几度隐没，复又出现，它们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辨认的成分而出现，而是穿着自己的服装，带着人们能看到的、摸到的自己的瘢痕而重现。这些创作，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创作——这个把伟大与生命力联结一起的称谓不会不恰当。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疑这伟大一词适合于马克思的理论。”^① 确实，马克思经济学正是在其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其“伟大的”理论的和学术的感召力。

^① 熊彼特著，吴良健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3页。

对 20 世纪这一百年间马克思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作出回顾，探寻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路标”，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现时代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对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回顾，显然不能只限于中国学者的理论成就和学术成果，也要关顾国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的学术探索和理论建树。在我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视阈的“盲区”，就在于对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多方面、多视野研究的缺乏和偏见。特别是在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教学中，缺乏对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了解和理解，就难以对 20 世纪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作出整体的理解，也难以对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作出整体的把握。这就是我们编写《百年论争》的初衷，也是我们力求形成《百年论争》特色的根本设想。

1. 对《百年论争》中涉及的“西方学者”的理解

《百年论争》注重于 20 世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研究，这里的“西方学者”，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赞成者，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反对者，还包括那些热心于“沟通”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者，以及那些自称“价值无涉”的所谓“纯粹学术性”的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者。这些由不同学术流派构成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思想作出的不同方面、不同倾向、不同观点的解说和理解，对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起着不同的作用。特别是这些“西方学者”之间在不同方面进行的不同倾向和不同观点的交流、交锋和交融，对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更是起着重要的影响。

即使在赞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西方学者”中，学术倾向也色彩斑斓、学术观点更莫衷一是。如果从他们的政治立场、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等差异上来看，大体可以区分出三种主要的理论倾向或者说主要的理论流派的学者。

一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些学者在政治上大多参加本国的或国际的工人运动组织或类似性质的组织、团体，有的甚至是这些组织、团体的领导人和主要的理论家。在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中，这些学者自视能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能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能在坚守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研究和探讨问题。但是，在一些重要的理论结论及主要的研究方法上，他们则从属于他们所在的组织、团体的理论上的需要，为他们所在的组织、团体

的路线、方针或政策寻求理论根据。如莫里斯·多布 (M. Dobb) 自 20 世纪 20 年代末之后的 40 余年间，一直是英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家；埃内斯特·曼德尔 (E. Mandel)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一直是“第四国际”的重要理论家之一。

二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或“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自认为也能够坚持和运用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分析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在政治上，他们同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政党组织，只在理论研究论题上有着某种联系，在组织上并不相关。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年可能参加过某种无产阶级政党或激进的政治组织，但后来就完全与之相脱离了；还有一些人至多只是通过某些“在政治上基本是边缘性的团体”，而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保持某些联系。在学术观点上，他们一般都认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在理论上的推动力现已耗尽，理论上的停滞只有通过新的探讨才能加以克服，这种新的探讨既包括直接回到马克思那里，也包括直接同资产阶级理论的对抗。”^①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与西方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相比较，更强调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重新研究” (restudying) 和“重新塑造” (reshaping)。他们试图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的研究中，既主张恢复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更倡导“马克思主义必须对世界作出重新解释，并在这一重新解释中，批判它过去已经提出的旧的解释”。^② 在这一类型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有保罗·巴兰 (P. Baran) 和保罗·斯威齐 (P. M. Sweezy)。

三是“教授的”或“校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最大特点在于，自认为是以“纯粹”的学者、教授来看待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他们与西方国家的任何具有政治性质的组织或团体没有丝毫的联系：在学术探讨上，他们也不打算为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提供什么新的理论见解和思想基础。他们主张“赞成” (for) 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成就、“反对” (against) 马克思经济学本身的缺损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非科学的理解，包括剔除他们认为的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已经“过时”或者“被扭曲”的成分。持这种倾向的较有影响的学者及著作有：M. C. 霍华德 (M. C. Howard)、J. E. 金 (J. E. King) 及他们合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

^① 格·哈达赫 (G. Hardack)：《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简史》，伦敦爱德华·安诺出版公司 1978 年英文版，第 60 页。

^② Sweezy, Paul M., Review of the Month; Marxism and Revolution 100 Years after Marx, *Monthly Review*, Vol. 34, No. 10, March 1983.

史》（两卷本）；安·布鲁厄（A. Brewer）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评论性的考察》；查里斯·巴罗纳（C. A. Barone）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思想：总结和评论》等。

对“西方学者”中的那些马克思经济学的反对者，从其理论倾向上，也可以作出类似的理解。卡尔·屈内（Karl Kühne）对“学术圈”内马克思经济学反对者的理论倾向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那些讨论马克思的著述是为了驳斥马克思并指责他的固有的错误的经济学家，其中重要的有庞巴维克（E. von Böhm - Bawerk）、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等。第二类是那些追随罗宾逊（J. V. Robinson）夫人的“著名评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的“著名评论”就是，“向一个被认为是科学家的经济学家学习，必须把他对经济体系进行的描述中有效的内容和他服务于自己的意识形态而进行的公开的或无意识的宣传区分开来”^①。这一经济学家群体在贬斥马克思经济学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阐述的重要原则的同时，也力求使用马克思经济学思想内涵和结构中蕴含的启发性建议。第三类是接受马克思经济学提出的基本问题，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的经济学家，但他们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类经济学家中较为著名的有卡莱斯基（M. Kalecki）、里昂惕夫（W. W. Leontief）等。第四类是那些最初的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家，随后开始朝着其他的方向发展，有的越来越疏远了马克思经济学，这类经济学家中包括 M. 布朗芬布伦纳（M. Bronfenbrenner）和 R. L. 米克（R. L. Meek）等。

这里所说的“西方学者”，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倾向上的这些复杂组合，同 20 世纪马克思经济学命运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屈内指出：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以后的专业经济学家，试图忽视马克思已经不再是荣耀的标志，因为“试图忽视马克思的，并不是由那些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作出的。比如，熊彼特、里昂惕夫和马歇尔（A. Marshall）等都对马克思的成就表示了极大的钦佩”^②。屈内特别强调：“必须注意到，马克思的思想曾在保守主义思想界引起过一定的反响。作为重要的保守分子，哈耶克（F. A. Hayek）就曾鼓足勇气承认，通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M. I Tugan - Baran-

^① Joan Robinson, Marx, Marshall and Keynes, Three Views of Capitalism, In Joan Robinson, *Collected economic papers*, Vol. 2, Oxford: Blackwell, 1960. P. 2.

^② Karl Kühne, *Economics and Marxism*, Vol. 1,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Shaw, Macmillan Press Ltd 1979, P. 43.

nowsky) 和施皮特霍夫 (A. Spiethoff)，他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① 届内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一部分就是资本过剩理论，而真正继承了这一理论的，却是一位铁杆保守主义者冯·哈耶克，他略有反常地但却是坦率地承认自己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重要的不只是注意哈耶克的保守主义的结论，而要看到他对繁荣和萧条的原因的分析，这种分析和马克思的分析非常接近。”^② 即使是庞巴维克，他在强烈地批判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相关内容的同时，仍然承认“在马克思体系的中间部分，逻辑的发展和连结呈现出一种令人赞叹的严密性和内在一致性……以其异乎寻常的逻辑连贯性，永远地确立了马克思作为第一流思想家的声誉。”^③

2. 对《百年论争》凸显的“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解

《百年论争》着力于 20 世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或“马克思经济思想”研究的述评。应该清楚，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者，“马克思经济思想”或“马克思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流域。

“马克思经济学”或“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学基本理论。这些基本理论构成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是马克思实现的经济学科学革命的最显著的标识，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构件和主要支柱。显然，全面把握“马克思经济学”或“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基本原理，是全面理解 19 世纪 40 年代及之后 40 年间马克思实现的经济学科学革命意义的基点，是认识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现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精神的基础，也是现时代发展和拓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对“马克思经济学”或“马克思经济思想”基本理论的理解和研究的主要思路和方法之一，就是综合分析国内外学者有关马克思及马克思之后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成果，以及依此而形成的各种理论流派和思潮，特别关注历史上有关的重要理论论争和新的理论探索，评价理论论争各方的主要观点、分析方法和学术背景、论争结果及其影响等。

与“马克思经济学”或“马克思经济思想”相对应的“马克思主义经

^① Karl Kühne, *Economics and Marxism*, Vol. 1,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Shaw, Macmillan Press Ltd 1979, P. 44.

^② Karl Kühne, *Economics and Marxism*, Vol. 2,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Shaw, Macmillan Press Ltd 1979, pp. 222 – 223.

^③ Eugen von Böhm-Bawerk,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49, pp. 88 – 89.

济学”，主要是指“把其方法论和研究建立在卡尔·马克思基础上的那些较为近期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中心论题，首先在于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本质上的矛盾，这种矛盾指的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结构产生的根本上的失灵，而不是某些和谐机制上表现出来的‘不完善性’。”其次在于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核心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这种在其结构上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冲突，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在技术形式方面已发展到采取国家政策的形式。”再次在于认为，“对作为这一制度动力的资本积累，不能只从量上加以分析，它所引起的经济结构上的变化受到阶级关系的影响，反过来促进阶级关系尖锐化。”最后在于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尽管会发生一些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仍然没有改变，它的历史可以区分为以一系列的特殊的阶级关系、技术、国家政策和国际结构为特征的不同阶段”^①。这一界说表明，与“马克思经济学”或“马克思经济思想”相联系和区别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建立在“马克思经济学”或“马克思经济思想”基础上的、由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基本理论取向的统称。

3. 《百年论争》选择的十大理论主题的说明

《百年论争》不是依照西方学者所在的不同国家和地区，或者依照西方学者的理论观点、理论流派来展示他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状况的，而是依照“马克思经济学”或“马克思经济思想”基本理论主题来展示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论争”主线的。

《百年论争》将“马克思经济学”或“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基本理论分为十个主题，即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意义，马克思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劳动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剩余价值和利润，转形问题，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利润率趋向下降理论，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与凯恩斯、斯拉法的比较研究。选取这十个理论主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些理论主题构成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理论观点。在《百年论争》中涉及的十大主题，如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等，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精髓和理论支柱，这些主题同马克思

^① 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马克思经济学卷》，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74页。

经济学在 20 世纪的几度“复兴”密切相关，是几次“复兴”的内在理论动因。屈内在对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复兴”原因的分析时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存在着三个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可能产生不同影响的因素，是马克思经济学“复兴”的动因。这些因素，一是“马克思为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创建了基础”，二是“马克思不只是经济学研究中许多理论的先驱者，而且为继续发展这些理论奠定了基础”，三是“尽管马克思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问题上保持了沉默，但是马克思至少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远至自动化时代的社会制度变革进行了概略的叙述”^①。这三个因素涉及的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就包含在以上提及的十大主题之中。

第二，这些理论主题呈现了 20 世纪西方经济学界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和论争的主要论题和脉络。如“转形”问题（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就是 20 世纪西方各经济学流派，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和主流经济学学者多次探讨和激烈论争的理论主题。甚至可以说，“转形”问题论争的起伏跌宕，就是 20 世纪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命运多舛的写照，也是 20 世纪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发展的主要线索。

西方学者所谓的“转形”问题，指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论及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发展的综合成果。一方面，生产价格作为价值的转化形式，对其形成机制和形成过程的理解，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不理解价值实体、价值实现及其转化机制，就不可能搞清抽象层次上的价值向具体层次上的生产价格转化的逻辑过程；另一方面，生产价格中的平均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离开了剩余价值理论就不可能搞清剩余价值到利润、利润到平均利润的内在转化关系。据此可以认为，转形问题论争实质上就是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地位及其意义的论争。

冯·博特凯维兹（L. von Bortkiewicz）在 1906 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体系中价值计算和价格计算问题》和 1907 年发表的《对马克思〈资本论〉第

^① Karl Kühne, *Economics and Marxism*, Vol. 1,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Shaw, Macmillan Press Ltd 1979, P. 5.

三卷基本理论结构的修正》的文章中，^① 试图用一个联立方程组来完善马克思对价值到生产价格的量的转化关系的论述，特别是希望能找到一个数学模型，解决成本价格在按生产价格计算时的这种量的转化关系。博特凯维兹的论文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直到 1942 年保罗·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一书中重提博特凯维兹这两篇文章时，^② 才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关注。同时，斯威齐也提出一个新的联立方程组，对博特凯维兹的论述作出补充。1948 年 C. J. 温特尼茨（C. J. Winternitz）发表的《价值和价格：所谓转形问题的解决》一文，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对博特凯维兹的第一次批判；莫里斯·多布 1955 年发表的《关于价值问题的探讨》一文、罗·林·米克 1956 年出版的《劳动价值学说史的研究》一书和同年发表的《关于“转形”的若干问题的探讨》一文，以及塞顿（F. Seton）1957 年发表的《关于“转形问题”》一文，都对转形问题作出了新的论述。这一时期，对转形问题的探讨，大多以“补充”或“完善”马克思既有理论为基本出发点，因而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圈子内的有着显著的“学术”取向的论争。

1960 年，斯拉法（P. Sraffa）的《用商品生产商品》的出版，使得转形问题的论争，“开始从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构建的技术性批判，转向试图证明对经济分析而言劳动价值论是不必要的，而且应当被抛弃”的论争。^③ 西方主流经济学营垒内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和新李嘉图学派，对转形问题提出了各自富有挑战性的论争。20 世纪 70 年代初，转形问题论争开始围绕价值理论的“可行性和重要性”展开，“参与争论的学者的数目和多样性、以及所考察的理论问题涉及的范围，都使得这次争论成为漫长的经济理论历史上最为显著的争论之一”^④。

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森，在 1971 年发表的《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与竞争价格间所谓转化问题概述》等文，提出了他的“橡皮擦算法”，认为“马克思对工业再生产的模式的分析确实

^① L. von Bortkiewicz, *Value and Price in the Marxian Syste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pers, 2, 1952, pp. 5–60; On the Correction of Marx's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Third Volume of Capital, In Sweezy (ed.)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pp. 197–221.

^② P. M. Sweezy,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 First Published 1942, pp. 112–25.

^③ Ernest Mandel, Introduction, In Ernest Mandel, Alan Freeman (ed.), *Ricardo, Marx, Sraffa: The Langston Memorial Volume*, Schocken Books, 1985, P. xi.

^④ Makoto Itoh, The Value Controversy Reconsidered, In *Radical Economics*, Edited by Bruce Roberts, Susan Feiner,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P. 53.

是原创性的”，但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劳动价值论似乎是一种迂回，对于理解竞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是不必要的。而剩余价值理论对于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这两个重要问题的分析，也几乎或完全没有帮助。”^①他在一定程度打破了从庞巴维克开始沿袭下来的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观点，转而认为劳动价值论是对于理解生产价格和一般利润率完全是“不必要的多余的。”萨缪尔森的研究同时受到赞成和反对劳动价值论的学者的质疑。1973年，森岛通夫（M. Morishima）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一书中，主要利用冯·诺依曼（J. Von Neumann）的线性规划技术，强调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概念只有在产业是“线性相关”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他以异质劳动和联合生产或固定资本时存在的理论上的困难为由，建议放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用冯·诺依曼类型的理论模型替代它。1974年，鲍莫尔（W. J Baumol）《价值转形：马克思的“真实”含义》一文用一种新的形式考察了转形问题，认为马克思转形问题的真实意图是用一个数学模型，说明通过竞争实现剩余在不同形式的资本之间收入分配的问题。^②这样，转形问题似乎成了纯粹的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

在新李嘉图学派中，1977年，伊恩·斯蒂德曼（I. Steedman）在《依照斯拉法研究马克思》一书，试图根据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提出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附和萨缪尔森的观点，认为均衡价格能够按照斯拉法的方法，直接从实物量体系和实际工资的计算中得出，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确定，完全不必求助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是“多余的”和“不必要的”。对转形问题论争的这些变化，“在年轻的西方学者中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学者现在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同新古典和新李嘉图主义经济学一样，可能值得进行数学分析。与此同时，他们被沿着斯拉法相同的思路进行的批判所感染”^③。

这一时期的论争，转变为三种理论方法——新古典主义、新李嘉图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对抗，如伊藤诚（M. Itoh）认为的呈现出“三足鼎立”

^① Paul A. Samuelson,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9, No. 2. (Jun. , 1971), P. 408.

^② Baumol, W. J., The Transformation of Values: What Marx ‘Really’ Meant: An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12 (1), March, 1974, pp. 51–62.

^③ Makoto Itoh, The Value Controversy Reconsidered. In *Radical Economics*, Edited by Bruce Roberts, Susan Feiner,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P. 59.

的局面^①。对这三种基本方法、主要观点和根本立场的理解和把握，成为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探索转型问题的新的论争的关键。

应该看到，类似于转型问题（也包括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这样的争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氛围中才能出现。在这种氛围下，对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质疑、反对乃至攻击才可能完全地暴露出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娴熟的数理经济方法也能得到广泛运用。这种氛围，在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学界是不存在的。当马克思经济学受到过多的非学术性的“保护”时，就难以在直面各种理论和学派的交流、交融和交锋中推进自身的发展。当马克思经济学缺乏现代分析手段时，就难以在理论经济学质态研究向量化分析的转变中实现自身的时代化。以西方经济学学术氛围为背景，展示马克思经济学主要论题论争的思想史过程，是切合于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发展的。

第三，这些主题突出体现了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的新的课题，如利润率趋向下降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研究，都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经济学”的趋向。同时，这些主题也比较全面地展现了20世纪西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新的趋势与倾向，如在对马克思与凯恩斯（J. M. Keynes）、斯拉法的比较研究中出现的“沟通”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倾向。

马克思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主题之一。霍华德与金在对“凯恩斯是如何看待马克思”问题的阐述中曾经认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三处提到过马克思，其中一处只是简单地承认马克思是“古典经济学”这一术语的首创者^②；另一处凯恩斯描写了1820年以后李嘉图经济学是如何成功地排除了总需求不足这一观点：“有效需求只能偷偷摸摸地生活在不入流的卡尔·马克思、西尔维·奥·格塞尔（Silvio Geseu）和道格拉斯（Douglas）少校的地下社会之中。”^③这显然是对马克思的不敬重、深有偏见的说法。在最后一处，凯恩斯断言，与马克思不同，格塞尔已经明确地否定了“古典假设”（即萨伊（J. B. Say）定律）。格塞尔这样做，就使得

① Makoto Itoh, *The Value Controversy Reconsidered*, In *Radical Economics*, Edited by Bruce Roberts, Susan Feiner,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P. 53.

②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Money and Interest*, London: Macmillan, 1936, P. 3.

③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7~38页。

马克思本人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变成多余的了；格塞尔的论著中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凯恩斯以游移不定的口气得出结论：“我相信，在将来，人们从格赛尔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为多。”^①

在霍华德和金看来，凯恩斯对马克思并非一无所知，也不总是对马克思持蔑视的态度。在 1920 年和 1921 年间或者 1921 年和 1922 年间，莫里斯·多布在当研究生时，曾在凯恩斯的房间里读到一篇论述马克思与剑桥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论文。多布回忆道，凯恩斯很赞许这篇论文，因为“他年轻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喜欢非正统思想”^②。凯恩斯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的文章中，对马克思多有诋毁，提出过诸如“一个如此不合逻辑，如此空洞的教条怎么能对人的思想从而对历史事件有如此强烈和持久的影响”^③ 的质疑等。但是，到 1933 年，大概在斯拉法的影响下，凯恩斯开始对马克思采取比较赞许的态度，在他关于古典货币理论的演讲中，婉转地提到马克思对实现问题的阐述，而且发现马克思和马尔萨斯在有效需求问题上的密切相似之处。

凯恩斯《通论》第一稿写于 1933 年。在第一稿中，凯恩斯对马克思作了近乎正确的理解。凯恩斯指出：“合伙经济和企业家经济之间的区别，同卡尔·马克思所作的大量观察有某种关系——尽管其后他对这一观察的利用是相当不合逻辑的。他指出，在现实世界中，生产的本质并不像经济学家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如 $W - G - W'$ 的情形，即把商品（或劳务）换成货币是为了获得另外的商品（或劳务）。这也许是私人消费者的观点，但不是商家的看法，后者认为是 $G - W - G'$ 的情形，即抛出货币换取商品（或劳务），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货币。”凯恩斯接着指出，这一观点的意义在于：企业家对劳动力的需求，依赖于生产预期的可获利性，而不取决于对人类需求的直接满足。在一个长脚注中，凯恩斯作了进一步阐述。 G' 超过 G 的余额，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源泉。令人不解的是，在经济理论史上，那些数百年来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用古典公式 $W - G - W'$ 反对 $G - W - G'$ 公式的异教徒们，或者倾向于相信 G' 总是并且必然超过 G ，或者倾向于相信 G 总是并且必然超过 G' ，这要取决于他们生活的时期哪一种思想在实践中占支配地位。马

^①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366 页。

^② Dobb Maurice, Random Biographical Not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 Issue 2, 1978, P. 117.

^③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London: Hogarth Press, 1926, P. 3.

克思与那些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具有剥削性的人断言， G' 余额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相信资本主义内在地具有通货紧缩和就业不足发展趋势的霍布森（J. A. Hobson）、福斯特、卡钦斯或道格拉斯少校则断言， G 余额是不可避免的。但当马克思补充说 G' 持续增加的余额，将不可避免地被一系列日益猛烈的危机或者企业倒闭和未充分就业所打断时，马克思正在逐渐接近不偏不倚的真理，可以推测，在这种情况下， G 一定会有余额。如果能够得到承认，我自己的观点至少可以有助于使马克思的追随者们和道格拉斯少校的追随者这两派达成和解，而不去理会那些不切实际空洞地相信 G 与 G' 总是相等的古典经济学家们（按照凯恩斯对这一术语的独特用法，古典经济学家就是指萨伊定律的支持者）。^①

但是，凯恩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赞许并没有持续下去。霍华德和金认为，1934年，凯恩斯又开始嘲笑马克思，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描述是不适合当时资本主义现实的。同年11月，他在一次广播讲话中指出：“如果李嘉图经济学说破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的一个主要后盾也将随之坍塌。”在同乔治·萧伯纳（G. Bernard Shaw）的通信中，他还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建立在李嘉图（D. Ricardo）学说（即萨伊定律起作用）基础之上的。他不屑一顾地把《资本论》比作《古兰经》，认为它们都是无用的教条，并抱怨说人们对于《资本论》的争议是“乏味的、过时的和学究气的”。凯恩斯的结论是：“《资本论》在当代的经济价值（排除一些偶然的但却非建设性的和不连贯的思想火花以后）是零。”^②

《百年论争》把马克思和凯恩斯、斯拉法的比较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主题，就是为了了解20世纪西方学者“沟通”马克思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过程和主要论题、基本倾向和取向等问题，拓展对马克思经济学在20世纪理论影响的理解。

第四，也许是最重要的，这些理论主题（除去关于“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意义”和“马克思与凯恩斯、斯拉法的比较研究”之外），都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到第三卷理论叙述部分的重要问题，甚至《百年论争》各篇的程序，也体现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逻辑。在这一意义上，《百年论争》也是对20世纪西方学者关于《资本论》研究的

^① 凯恩斯：《就业、货币和利息通论》1933年的草稿，转引自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93页。

^② 凯恩斯：《凯恩斯先生答肖伯纳》，转引自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主要理论问题的述要。

需要说明的是，《百年论争》编写时间长达 10 年，期间数易其稿，在内容和结构上都做过许多次变动。为了集中于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中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和制度、有关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过渡和转型问题等，都没有列入本书的主题之内。

4. 《百年论争》采取“述要”方式的说明

《百年论争》以“述要”的方式，展示 20 世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研究的瑕瑜和得失。《百年论争》中的十个主题，涉及西方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学流派的 200 多位经济学家的近 300 篇（部）著述中的观点。所谓“述要”，首先强调对不同学者所要论述问题的基本观点的陈述，以及不同学者在对同一理论问题论争中的不同观点及其分歧的陈述；在对这两个方面陈述的基础上作出简要的评论和评价。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广大的研究者在进一步研究中有更大的空间，也是为了避免对不同的学术观点流于简单的“贴标签”式的评论。其实，“述要”的基本思路，在对《百年论争》十个主题的确定上，特别是在对每个主题的主要论题的梳理上、在对主要理论观点以及相应著述的选择上，已经得到较为完全的体现了。

总 目 录

第一篇 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代意义

第1章 马克思经济理论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	5
第2章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当代意义	31

第二篇 马克思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第3章 生产关系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对象	67
第4章 马克思经济学方法概述	90
第5章 霍奇斯论《资本论》的方法	121
第6章 马克思的历史方法及其运用	129

第三篇 劳动价值理论

第7章 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意义	147
第8章 对劳动价值论现代意义的理解	164
第9章 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补充”和质疑	193
第10章 对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地位的质疑	219
第11章 同质劳动与异质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	257
第12章 价值判断和商品拜物教问题论争	270
第13章 价值决定与技术选择和联合生产	296
第14章 劳动价值论的哲学和方法论问题	303

第四篇 货币理论

第15章 阿诺对马克思货币理论形成史的探讨	349
-----------------------------	-----